

建構新「祖國」 ——鄭彥棻時期(民國39-47年)的僑務工作

李道緝*

摘要

民國38年中華民國遷臺後的僑務工作，在新人新政的鄭彥棻藉由國民革命（尤其是孫中山）成功的將原先毫無關係的海外僑胞與臺灣連結起來。華僑熱烈的慶祝光輝十月，形塑華僑對新「祖國」四海歸心的民意趨向，穩固了臺灣在華人世界中的正統地位。僑生回國接受反共教育，培養了「新」一代華僑，他們認同的是政治上的祖國，而非其原鄉的祖國。臺灣政府鼓勵華僑回國投資，更以優沃的經濟利益，吸引僑資生根臺灣。這些措施使臺灣時期的僑務工作開展出生機盎然的新頁，但它的內向性，亦使島內出現了新的「華僑」成分，進而加重了臺灣的「中國」色彩。

但這種新架構（華僑——國民革命——臺灣）可說是全然的政治性連結，有其結構的脆弱性。即當雙方不再有這共同記憶時，虛擬的連結即易解構。其次，兩岸形勢使臺灣太需要華僑的支持，政府必須付出非常多的資源來供養這種支持。華僑於是被供養成「特權」的形象，當前述的連結瓦解時，這種關係終歸會趨於顛覆。在時代轉換之際，鄭氏曾成功的銜接、置換大陸時期到臺灣時期僑務工作的命題論述，但缺乏先天母體的滋養，後天形塑的代價是昂貴而辛苦的。

關鍵詞：僑務、鄭彥棻、華僑、臺灣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To Construct a New “National State”
—— Overseas Chinese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Zheng Yen-feng Period**

Tao-chi Lee*

Abstract

After the R.O.C. government transferred to Taiwan in 1949, state development had to begin afresh, and this included overseas Chinese matters. However, the base of the new work was hugely different from before, and it demanded fresh thinking and implementation. For overseas Chinese matters, the new administrator Zheng Yen-feng adopted a new discourse where the overseas Chinese were connected with Taiwan through Sun Yat-sen’s successful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warm celebrations of 10 October hel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served to focus their hearts and minds towards Taiwan, their new National State, and this strengthened the legal position of Taiwan in the Chinese world. Overseas students came to Taiwan to receive anti-communist education, and the result was a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who identified with the political state rather than the home state. Overseas Chinese were encouraged to invest in Taiwan, and preferential terms and high economic benefit provided strong incentives for these investments to take root in Taiwan. These measures thus enabled overseas Chinese administration of the 1950s to develop a new vitality and stabilized the R.O.C. position in overseas Chinese societie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owever, its introverted nature also gave rise to a new overseas Chinese element in Taiwan, and this increased the China element in Taiwan.

This new construct of overseas Chinese - national revolution - Taiwan was a fresh political connection, but it had its own structural fragility. When the common memory was no longer pursued by either side, the construct came apart easily. Again,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pushed Taiwan to seek overseas Chinese support, and the government had to use huge resources to nurture this support, which gave rise to the image of the “privileged” overseas Chinese. When the afore-mentioned connection broke down, the relationship also finally collapsed. In this transitional period, Zheng Yen-feng successfully continued and transformed the discourse concerning overseas Chinese administration from mainland China to Taiwan. However, overseas Chinese lacked that genuine feeling they had towards their real motherland in their dealings with Taiwan, and so the price of construction was expensive and difficult.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administration, Zheng Yen-feng, overseas Chinese, Taiwan

中國之有僑務，始於 1893 年清政府正式取消海禁，開始對海外華人採取積極政策。自此之後，中國政府各項的僑務措施，諸如僑務機構的設置、國籍法的頒訂、鼓勵華僑回國投資的措施、華僑教育與華僑新聞事業等等，無不圍繞著一個主題，即連結海外華人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強化海外華人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同時，自 19 世紀末以來，國運多乖，而愈在國勢困厄之際，則愈強調海外華人對國家的重要性。

民國 38 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世局嬗變，國難日艱。就僑務工作而言，自民國 17 年創設僑務委員會以來，二十餘年間政府在海內外努力建置的僑務體系、人員編制、關係網路等，幾瀕於渙散、瓦解，政府僑務工作，實有賴從新組建。民國 39 年，蔣中正在臺復行總統職權，國民黨設「中央改造委員會」，進行組織重建，8 月，任命鄭彥棻為第三組主任，主持海外工作，重新開啟了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僑務工作。41 年 4 月，鄭氏奉派接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之前由外交部長兼任），至民國 47 年 7 月隨行政院總辭，交卸委員長職務。在鄭氏主政時代，僑務工作可謂從大陸時期轉變為臺灣時期，值此轉換之機，僑務工作在延續與更遞之間，出現微妙的變異。這一變異，直接影響往後臺灣的僑務發展，並間接使臺灣社會出現了從未有過的「華僑」成分，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

壹、時代背景

鄭彥棻，廣東順德人，民前 9 年生，民國 10 年進入廣東高等師範，12 年加入國民黨，13 年廣東大學（原廣東高等師範）畢業後，在高師附小服務一年餘，獲校長鄒魯特選赴法留學，初入里昂中法大學，即被選為國民黨駐法總支部里昂支部執行委員，後進入巴黎大學統計學院，主修統計。國民黨清黨後，18 年奉中央指派為駐法總支部指導委員，負責黨務整理。19 年，進入國聯秘書廳工作。24 年，承廣州中山大學（即原

廣東大學）校長鄒魯電邀回國擔任該校法學院院長，26 年 7 月，抗戰爆發，應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委宋子文電邀，擔任專門委員，正式進入政府部門擔任公職，先後擔任多項重要職務。39 年 7 月，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前，擔任首屆立法委員，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後，鄭氏被選派為 16 位改造委員之一，並被任命為第三組主任，主持海外工作，爭取僑心。41 年 4 月，奉派接任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長，身兼黨政兩職的海外僑務、黨務工作，開始實際負責臺灣時期僑務工作的開展。¹縱觀鄭氏的從政經歷，除了在留法期間，曾經參加過海外黨務的經驗外，並無實際參與僑務工作的經驗，此次負責海外工作，其亦自承「對海外工作體驗不深」²。之所以由其負責海外工作，相信與其籍貫有密切關係，因在此之前，國民黨海外工作（海外部或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的負責人，例為閩籍或粵籍出身，以符海外僑情，而在 16 位改造委員中，僅鄭氏一人為粵籍。³而在國家百廢待舉之際，由「體驗不深」的鄭氏出掌海外黨務、僑務，亦可謂新人新政，重新出發。

民國 39 年在臺灣的僑務工作，是一個從頭開始、艱困的、亦是從未有過的奇特新局面。首先，就組織而言，鄭氏回憶，「初到中央黨部第三組的時候，全體工作同志只有十餘人，和海外許多地方都失卻聯絡。我初到僑委會的時候，是在南京西路一間店舖式房子辦公，全體工作人員也只有三、四十人。」⁴而就筆者所知，當時黨的海外部及政府的僑委會的檔案卷宗，絕大部分都未攜來臺灣，黨政在海外的組織聯繫，為之

¹ 參考蘇錫文編，《鄭彥棻先生年譜初稿》（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80 年）；鄭彥棻，「四十三自述」，臺北：司法官訓練所，民國 56 年，打字本。

² 鄭彥棻，〈「乃役於僑」十二年〉，收於鄭彥棻，《往事憶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67 年，再版），頁 116。

³ 司馬芬，〈鄭彥棻功在僑務〉，彥棻文教基金會編，《鄭彥棻先生紀念集》（臺北：編者刊，民國 80 年），頁 330。

⁴ 鄭彥棻，〈「乃役於僑」十二年〉，《往事憶述》，頁 132。

中斷，僑務工作幾乎是處在停頓狀態。故在臺灣的僑務工作，可說是從頭開始。其次，當時國府所面對的海外華僑社會，是一個艱困的局面，由於華僑在世界各地分佈廣泛，各地的情況雖不得而知，但從一些地區的狀況，亦可見微知著。以緬甸而言，當時緬甸是第一個承認中共的國家，我駐緬甸大使是第一個投共大使，國民黨駐緬總支部執行委員 21 人，有 16 人投共變節，僑團僑校親共的佔 2/3，國府在當地僑社處境的惡劣與艱苦可想而知。⁵即使是與國府仍保持邦交的國家，如泰國，在民國 38 年底，各主要僑團立場即已紛紛轉向，準備改懸五星旗，只因泰國政府強力警告，⁶各僑團才未懸掛五星旗，但昔日旗海飛揚的雙十國慶也於冷清中渡過。就當地記者訪察各商家所得，他歸結為三點：第一，僑胞希望掛升新國旗，但為泰國政府所不准，只好「不掛」；第二，舊國旗為中國人民所遺棄，掛了良心過意不去；第三，既然左右為難，只有裝作打瞌睡一樣，讓意義重大的雙十節靜悄悄的溜過去。⁷而鄭氏在民國 41 年 10 月在立法院報告時，亦指出如泰國中華總商會、印尼華僑公會、洪義順公會、亞弄公會、福建會館、廣肇會館等重要僑團或自動改變態度、或被奪回的情形，⁸可想而知上述這些僑團在大陸陷落前後立場的轉變。綜言之，在鄭氏接掌海外僑務工作之際，海外華僑社會大部分的政治立場實已動搖或轉向，鄭氏的海外工作，要從「光復」僑社開始。

最後，國府撤退來臺後，在僑務上所面臨最嚴峻的考驗在於，復興基地——臺灣並非華僑的僑鄉。大陸時期，華僑的血緣、鄉土認同與國家認同是一致的、重疊的，其國族論述是清楚的、循序的，即僑務工作

⁵ 盧偉林，〈青年導師華僑保姆——鄭彥公精神永生〉，《鄭彥棻先生紀念集》，頁 374。

⁶ 〈敬告旅泰華僑文告〉，《中原報》（曼谷），民國 38 年 10 月 4 日，5 版。

⁷ 〈昨天雙十節，本京僑胞冷靜渡過〉，《中原報》（曼谷），民國 38 年 10 月 11 日，5 版。

⁸ 鄭彥棻，「僑務興革計劃及當前僑務改善要點與辦理情形」，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檔號：306,HW782.886 8458（5），no. 306，手稿本，民國 41 年 10 月。

多從血緣、鄉土認同的基礎上建構出其國家認同。民國39年以後，華僑與臺灣並不存在血緣上及鄉土上的連結，而華僑始於血緣、鄉土而逐漸擴及於政治的國家認同概念於焉斷裂。另一方面，臺灣地區也不存在「華僑」的時代背景，鄭彥棻於接掌海外工作後，亦指出「當時，臺灣很難看到華僑的踪影，一般老百姓對華僑也多一無所知。」⁹可見兩者之間幾乎不存在任何的關連。故他多次指出「臺灣並不是華僑的家鄉」¹⁰，對待華僑要有特別的方式。所以，鄭氏主政期間，對華僑的訴求往往越過最為緊密的血緣、鄉土認同，而直接訴求於政治認同（詳後），即「使各地僑團，不僅為經濟性或地域性之組織，且使之具有正確的政治認識。」¹¹而正由於這種特殊的雙邊關係，致使臺灣時期的僑務工作，出現「加強僑胞與祖國（臺灣）間相互的認識」¹²、鼓勵僑胞回國「觀光」等吊詭的情形。

貳、華僑與臺灣：新政治論述的建立

民國39年7月，鄭氏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三組主任後，他認為當前急務是主客觀環境皆發生劇烈的變化，但大家對海外工作的認識和做法卻見仁見智，觀念並不統一，所以，「我覺得首先要做的，是建立明確的觀念、目標和方針，使大家能觀念一致，步調一致。」¹³至於如何建立明確的觀念等，對僑務工作「體驗不深」的他決定實地探訪僑胞的意見。故9月初，鄭氏即以出席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名義，隨團赴美

⁹ 鄭彥棻，〈「乃役於僑」十二年〉，《往事憶述》，頁132。

¹⁰ 鄭彥棻，「三項僑務工作的檢討」，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檔號：329,HW782.886 8458 (5), no. 329，手稿本，民國46年；鄭彥棻，〈「乃役於僑」十二年〉，《往事憶述》，頁127。

¹¹ 鄭彥棻，「四十一年度的僑務」，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檔號：311,HW782.886 8458 (5), no. 311，打字本，民國46年，頁2。

¹² 鄭彥棻，「四十一年度的僑務」，頁2。

¹³ 鄭彥棻，〈「乃役於僑」十二年〉，《往事憶述》，頁117。

，其後並轉赴美洲各地訪問僑胞，進行實地考察。¹⁴此行途經菲律賓、美國各大城市、中南美洲17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綜計歷時5月餘（167天），足跡遍20個國家56城市。期間分別訪問各地僑團、僑報、僑校、養老院及僑胞經營的企業、農場及各地的國民黨黨部。¹⁵鄭氏此行，時間之長，經歷地方之廣泛，接觸僑胞之眾多，¹⁶除參訪慰問僑胞之外，明顯具有穩固我美洲僑社之用意。蓋自晚清有僑務以來，中國政府派遣中央大吏遊歷各埠，宣慰僑情之舉，往往皆含有動員僑胞，報效國家之用意。而僑胞因遠適他鄉，寄人籬下，故國之念特別深刻，對祖國所派遣往訪之大員，往往以隆盛之禮接待，以示對祖國忠愍之忱。因此，這種接待儀節往往具有政治上「奉正朔」之意涵。例如中國政府第一次較具規模的派遣中央級官員出洋宣慰僑情者，當屬光緒33年（1907）派遣農工商部右侍郎楊士琦為考察商務大臣，前往南洋各埠考察、宣慰各地僑胞之舉。楊氏乘軍艦由上海出發，歷經菲律賓、西貢、曼谷、巴達維亞、三寶壟、泗水、日惹、梭羅、汶島、新加坡、檳榔嶼及大小霹靂等地，沿途「舟車所至，廣布皇仁，博諮民隱」，而各地僑胞的回應，楊氏以「使車所至，衢市闐溢，家設香案，戶懸國徽，結綵張燈恭迎恩命」來形容。¹⁷40餘年後鄭氏之宣慰美洲各埠僑胞，如鄭氏所言，「所遇到的僑胞都熱烈的流露著熱愛祖國，關懷祖國，擁戴總統的情緒。彥棻到達每一個城市，僑胞為了表示他們這種愛國熱情，他們都熱烈的開會歡迎。」¹⁸而在此之後，鄭氏先後於民國41年2月至5月訪問東南亞的泰國、越

¹⁴ 蘇錫文編，《鄭彥棻先生年譜初稿》，頁 98。

¹⁵ 蘇錫文編，《鄭彥棻先生年譜初稿》，頁 104；鄭彥棻，〈海外革命三老〉，《僑胞的動向與路向》（臺北：海外出版社，民國 41 年），頁 69。

¹⁶ 記者估計各地僑眾與鄭氏接談者，總計達二萬三千人。銘，〈海外人心敬仰 總統偉大〉，《僑胞的動向與路向》，頁 173。

¹⁷ 〈農工商部右侍郎考察商務大臣楊奏考察南洋華僑商業情形〉摺，《東方日報》號 5 期 5（光緒 34 年 5 月 25 日），商務，頁 28-29。

¹⁸ 鄭彥棻，〈海外僑胞對祖國的熱愛和期望（40 年 4 月 16 日應臺北軍中廣播電台播講）〉，《僑胞的動向與路向》，頁 11。

南、寮國（今老撾）、高棉（今柬埔寨）及菲律賓等地。46年5月至8月，又先後訪問了美國、加拿大，及歐洲的英國、比利時、法國、西德及東南亞泰國等地。47年4月至5月，再出訪菲律賓及香港等地。¹⁹可以說，鄭氏藉由頻頻訪問各地僑胞的舉動，實有向世界各地僑胞宣示「祖國」正統之所在，是臺灣而非中國大陸。

除了以具體的官員往訪，爭取僑胞的支持外，最重要的是，在沒有血緣、鄉土紐帶的情況下，如何以一種新的政治論述，架構華僑與陌生的臺灣之間的關連性，讓臺灣成為華僑的政治認同對象，是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重要的課題。

分析鄭氏幾次出國訪問，都有幾個重點活動。首先，每次鄭氏出訪，都會攜帶蔣中正總統對當地僑胞親筆簽署的慰問信函，並在演講會場鄭重宣讀，信函內容多大同小異，除對僑胞致問候之意，並述赤俄侵略世界的野心，及我是世界民主國家反共抗俄的堅強堡壘外，必然會提到僑胞與「祖國」（指臺灣）間的關係，他的論述大致如下：

惟此一歷史使命（按：反共復國），責艱任重。所望我海外僑胞精神與物質之協助者，尤為殷切，僑胞與祖國休戚與共，僑胞之寄望祖國，一如祖國之寄望僑胞，以我海外僑胞過去熱愛祖國，贊襄革命，促進民主之光榮，值此國家命脈存亡絕續之交，必能更盡其最大之努力。²⁰

這一論述，成為今後臺灣僑務工作的主軸，充分反映在民國 42 年 11 月 14 日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所通過的「加強海外工作方案（報告第一號）」中，該報告開宗明義指出：

¹⁹ 蘇錫文編，《鄭彥棻先生年譜初稿》，頁 106-109、121-122、124。

²⁰ 〈蔣中正致旅美僑胞函〉，民國 39 年 9 月 6 日，見蘇錫文編，《鄭彥棻先生年譜初稿》，頁 99。

說明：海外是反攻大陸的跳板，支援臺灣的基地，更是國際反侵略戰鬥的戰場。

海外僑胞數逾一千三百萬，無論人力、物力、財力都極充沛，本黨倡導國民革命的初期，固全賴僑胞的參加和支持，其後討袁、護法、北伐、抗戰諸役，僑胞也都有很大的貢獻。目前如能把僑胞的力量團結和動員起來，固然是反共抗俄的一支偉大主力，而且由於僑胞身處海外，從違依捨，可不受強制，其政治趨向，足以表現真正民意的歸趨，為國際所注視，如散佈全球各地之僑胞，均同為反共而努力，更有助於國際反侵略陣線的結合，而為最後勝利的保證。²¹

在這論述之下，就如蔣中正所言，「反共復國的三大力量在臺灣、海外和大陸」²²。然而，海外僑胞為何要協助臺灣反共抗俄，兩者如何連結起來，其關鍵環結即在於「以我海外僑胞過去熱愛祖國，贊襄革命，促進民主之光榮」或「本黨倡導國民革命的初期，固全賴僑胞的參加和支持，其後討袁、護法、北伐、抗戰諸役，僑胞也都有很大的貢獻。」換言之，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與海外僑胞之間，有著「革命」的共同情感，藉由昔日的共同歷史記憶，轉化為今後的偉大助力。因此，在鄭氏歷次出訪的或對僑胞的廣播中，總不忘提醒華僑對革命，尤其是對孫中山革命的歷史記憶。例如，在第一次出國訪問途中，鄭氏就特地探訪了孫中山在海外的三位老友：檀香山的鍾宇工、橫濱的溫炳臣及孫中山自傳

²¹ 「加強海外工作方案（報告第一號）——民國 42 年 11 月 14 日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全議通過」，〈第三次全體全議（民國 41 年 11 月 2 日-14 日）重要決議案〉，《中國國民黨七至九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 83 年），頁 49-50。

²² 鄭彥棻，「僑務工作的回顧與展望——僑務委員會成立四十年紀念」，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檔號：1187,HW782.886 8458（5），no. 1187，手稿本，民國 70 年 4 月 10 日。

所稱「山田兄弟」的山田純三郎，並為文紀念，盛讚他們「愛黨愛國，值得每一同志和每一國民敬仰效法」；²³而僑委會提供給海外僑胞的「精神糧食」，即有《國父對海外僑胞的遺教》、《國父在海外》、《革命領袖對海外工作的指示》等，²⁴不斷強化華僑與孫中山之間的關連，由孫中山進而連結到與其一脈相承的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此外，鄭氏對海外僑胞的歷次廣播中，總是將華僑、革命、建國三者合而為一。例如青年節，「我們更希望海外青年僑胞，發揚傳統的革命精神，效法先烈，各站崗位，為反抗極權、爭取自由，掃蕩赤氛，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²⁵勞動節，「華僑勞工曾經表現了許多轟轟烈烈的光榮史蹟，例如溫生才……」；²⁶國慶日，「中華民國，是革命先烈和海外志士鮮血頭顱的結晶」。²⁷

而將三者關係論述得最為詳盡的當屬〈海外僑胞團結起來〉，茲節錄如下：

五十年來，海外僑胞曾有過兩次大團結：第一次在滿清末年，海外僑胞在 國父的領導下，……終於推翻了滿清專制政體，建立了中華民國，海外僑胞也贏得了「革命之母」的稱號。第二次在抗戰時期，海外僑胞在 蔣總統領導下，……終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求得了祖國國際地位的平等，……現在又到了海外僑胞需要一心一德，精誠團結的時候了。

……

²³ 鄭彥棻，〈海外革命三老〉，《僑胞的動向與路向》，頁 69-75。

²⁴ 鄭彥棻，《僑務問題的新認識》（臺北：海外出版社，民國 42 年），頁 41。

²⁵ 鄭彥棻，〈發揚海外青年的革命精神——40 年 3 月 29 日青年節對海外僑胞廣播〉，《僑胞的動向與路向》，頁 85。

²⁶ 鄭彥棻，〈勞動節談海外勞工僑胞——40 年 5 月 1 日勞動節對海外僑胞廣播〉，《僑胞的動向與路向》，頁 92。

²⁷ 鄭彥棻，〈僑胞應如何紀念國慶——為 39 年度國慶紀念而作〉，《僑胞的動向與路向》，頁 102。

海外僑胞對反共抗俄究竟應有怎樣的共信呢？

- 一、抗俄是國民革命現階段的任務，共匪俄帝和滿清政府、北洋軍閥、日本帝國主義是一脈相傳的反革命勢力，我們應本國民革命的一貫精神去反共抗俄。反共抗俄的最終目標也就是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建設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
- 二、臺灣是中華民國反共抗俄的基地，也是民主國家反共抗俄的先鋒，要完成反共抗俄，一定要以全力確保臺灣。臺灣今日的地位，正是辛亥革命前的海外，北伐時期的廣州，抗戰時期的重慶。確保臺灣不但是臺灣軍民的責任，也是海外僑胞和世界民主人士的共同責任。
- 三、中華民國唯一的合法政府是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這個政府如被推翻就是中華民國的滅亡。自由中國儘可有不同的反共政黨，卻只有一個政府，政府的施政容或有尚待改進的地方，但政府的法統和地位卻不容稍有懷疑。海外愛國同胞必須維護這一法統，支持這一政府。²⁸

由此一論述可知，臺灣時期僑務工作的立基點與大陸時期截然不同，在缺乏血緣、鄉土、國族三合一的情況下，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透過海外僑胞——革命（孫中山）——中華民國臺灣的連結，建立了一套嶄新的、想像的歷史記憶，將臺灣與海外華僑結合起來。這一新的政治論述，在鄭彥棻主政僑務時期即已完成。

參、從海外僑務到國內僑務

政府遷臺前後，由於客觀環境出現前所未有的大變化，祖國與僑胞之間的關係亦隨之易勢。首先，就人數而言，海外僑胞雖號稱有 1,200

²⁸ 鄭彥棻，〈海外僑胞團結起來〉，《僑胞的動向與路向》，頁 123-125。

萬之多，但相較於祖國的 4 億 5 千萬人口，其比例即顯得微不足道。其次，華僑資財雖多，自清末以來即為中國政府所重視，但在總體財政上，直到大陸淪陷前，華僑投資的金額並不大。²⁹而且，無論人數或華僑投資，多集中為其僑鄉閩、粵兩省，故在遷臺前，僑務工作雖然重要，但對中央政府而言，不是急務。三者，戰前中國雖不是強國，對週邊國家而言，終究是一個大國，故對於週邊國家，尤其是僑胞所聚居的東南亞地區，其僑務機構的設置，主要是以移民監督與保育華僑為其僑務工作重點，故戰前僑務工作主要是放在對外發展方面。但隨著政府遷臺，形勢轉，政府政策勢必因應客觀條件而改變，鄭彥棻在論當前僑務政策時，即認為政策必須根據當前華僑地位的重要性及其需求調整，這個重要性在於：一、海外僑胞人數在一千二百萬以上，比臺灣軍民全數還要多出 50%；二、僑胞分布全球各地，所有重要地區都有華僑足跡和他們的事業；三、僑胞在各地，……在經濟上和社會上都很有力量，尤其是在東南亞。³⁰所以，「祖國對僑胞的需要，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迫切」。³¹在此形勢下，臺灣時期的僑務工作重點，勢必會隨著需求的迫切而由側重國外轉而成為側重國內，這樣的一個轉變，使日後臺灣出現了前所未見的「華僑」內政現象。

首先，就政策的制定而言，民國 20 年僑務委員會組織法公布時，我國僑務工作的職掌主要以移殖保育為主。³²遷臺後，民國 40 年 4 月行政院即針對情勢，制定「反共抗俄時期僑務政策」。³³而較具體、完整反映當

²⁹ 學者估計，從 1862-1949 年間，華僑投資國內企業不到 3 億銀元。見林金枝，《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概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 年），頁 36。

³⁰ 鄭彥棻，《僑務問題的新認識》，頁 21。

³¹ 鄭彥棻，「當前的僑務綱領及推進的基本原則」，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檔號：316.HW782.886 8458 (5), no. 316，手稿本，民國 43 年。

³² 詳見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臺北：國史館，民國 86 年），頁 78-79。

³³ 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僑務發展歷程——攜手走過的歲月》（臺北：僑務委員會華

前僑務形勢者，則屬民國 41 年 10 月由僑委會召開的全球性僑務會議，出席會議的代表，除政府約請的專家及僑教有關人士 58 人外，其餘 250 位代表均來自海外各地（亞洲 199 人，美洲 39 人，大洋洲 6 人，非洲 4 人，歐洲 2 人），總計 308 人，會中通過「當前僑務綱領」，復經行政院第 270 次會議通過，正式成為反共抗俄時期僑務工作的準繩。綱領共分 4 項：

- （一）藉外交關係之改善，確保僑胞權益。對僑居承認中共政權國家同胞之權益，力謀維護；對收復地區僑眷之生活權益，切實予以合法的保障。
- （二）促進僑胞團體間之合作，俾有充分力量解決自身問題，發展其所經營之事業，並加強反共抗俄工作。
- （三）獎進僑民教育並扶持海外文化事業，俾僑胞均能繼承祖國文化之優良傳統；僑生回國升學特予便利。
- （四）僑胞回國興辦生產事業，對物資輸入、資金週轉、盈餘結匯、動力供應、技術輔導等，均予以協助與便利；並鼓勵僑胞回國服務，擔任公職。³⁴

分析四項綱領內容，明顯可以看出政策的內縮性。首先，就確保僑胞權益而言，就當時政府國力而言，無異緣木求魚。時任行政院長陳誠即坦言：

說到確保僑胞權益問題，無論站在外交的立場或僑務的立場，我們都覺得沒有盡到什麼責任，有負人民的託付。諸如菲律賓的「菲化」案，……泰國的「隨身證」案，菲、越、印尼的「國籍法」案，星馬的「公民權」案，都是重大的案子。……我們確曾運用過各種方法，希望能夠有所挽回，有所補救，而成就的都很有

僑通訊社，民國 79 年），頁 78。

³⁴ 鄭彥棻，《僑務問題的新認識》，頁 32。

限。外交是靠著武力作後盾的，僑務亦然。中國至於今日，萬事莫急於反共，萬急莫大於求友，凡是反共、非共的國家都是我們應當求之為友的對象；退一萬步說，即使不能求之為友，亦不應樹之為敵，這道理是很明顯的。於是我們對於新興國家的僑務與外交遂陷於矛盾的泥淖中，而無以自拔。³⁵

陳誠的分析，可說一針見血，直指問題的核心，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政府的確無法致力於保護華僑的工作。於是臺灣的僑務工作，只能退回島內，自己可以掌控的部分，至於海外僑務，僅能「促進僑胞團體間之合作，俾有充分力量解決自身問題」了。而島內僑務工作之重點，在民國 46 年底鄭氏主政後期，已可以明顯看到集中於僑團回國觀光、僑生回國升學、僑資回國參加生產建設這三項了。³⁶

首先，如前所言，「祖國」臺灣和華僑並無淵源，歷史的偶然讓兩者結合在一起。故鄭氏首先應做的，即是其列為 41 年度僑務工作重點之「加強僑胞與祖國間相互的認識」。³⁷事實上，自鄭氏接掌改造委員會第三組主任後，即無時無刻不在強化兩者間的相互認識。例如民國 41 年元

³⁵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臺北：國史館，民國94年），頁379。筆者按：菲律賓的「菲化案」、泰國的「隨身證」案等都是當時東南亞國家限制華僑權益的重大案件。以「菲化案」為例，其全稱為「菲律賓零售商業菲化法案」，1954年5月20日此案在菲律賓國會通過，6月19日拉蒙·麥格塞塞（Ramon Magsaysay）總統簽署批准。該法律規定：立即停發外僑零售業營業執照，新申請者必須為菲律賓人；凡在1954年5月15日以前已從事零售業的外僑，准予經營至本人死亡止；如為合伙或公司組織，准予繼續經營10年；並規定違法者吊銷其執照或遣送出境。

³⁶ 鄭彥棻，「三項僑務工作的檢討——國民黨中央總理紀念週報告」，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檔號：329.HW782.886 8458（5），no. 329，手稿本，民國 46 年 11 月 25 日。

³⁷ 41 年度僑務工作，大致可以分四方面：（一）促進僑胞團結；（二）解決僑胞困難；（三）輔導僑胞事業；（四）加強僑胞與祖國間相互的認識。見鄭彥棻，《僑務問題的新認識》，頁 33。

且，其即舉辦「華僑愛國運動照片展覽」，俾臺灣人民能夠瞭解華僑與中華民國的關係。³⁸而在其後出國訪問時，鄭氏都攜帶介紹臺灣各方面情況的照片、影片，帶到各地巡迴展覽，讓僑胞透過影像能夠更明瞭自由祖國的現況，他認為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他亦認為，電影是最有效的一種辦法，而希望加強電影的製作。³⁹而透過廣播、演講、照片展覽、影片播放等方式，海外華僑開始對這陌生的島嶼有了初步的印象及興趣。民國 39 年 8 月，由吳金聘所率領的「菲律賓華僑考察團」回國考察，是政府遷臺後第一個回國觀光考察的華僑團體，接著「蘇門答臘華僑觀光團」、「暹羅華僑回國觀光團」等等先後組團回國。⁴⁰至 41 年 7 月，僑委會已感藉十月慶典而來臺灣觀光的華僑日益眾多，遂呈請行政院撥交位於北投的行政院招待所，為接待之用，於是有北投「僑園」之設。⁴¹自此以後，在臺灣的節慶中，遂出現了因華僑熱愛「祖國」的「光輝十月」盛景，據鄭氏評估：「策動僑胞組團回國觀光，……自民國 39 年起至民國 45 年 12 月止，計有 412 個單位，共計 9,276 人。尤以 45 年 10 月回國參加國慶及祝壽的僑胞，多達 83 個團體，計 2,152 人，創下以往空前紀錄。」⁴²對於此點，鄭氏頗感自豪，認為達到了民國 42 年「加強海外工作案」所訂定之方針：「僑胞……其政治趨向，足以表現真正民意的歸趨，為國際所注視。」故在次年檢討有關僑團回國觀光問題時，鄭氏即言：「僑團回國觀光，是熱心愛國的表現，人愈多愈表現出熱烈的程度，地愈廣愈顯示一致嚮往自由祖國。」⁴³從此而後，僑胞回國參加十月慶典，遂成例年僑務工作的重點。至民國 73 年的光輝十月，回國的

³⁸ 蘇錫文編，《鄭彥棻先生年譜初稿》，頁 106。

³⁹ 鄭彥棻，〈重視華僑力量展開海外工作——40 年 5 日在中央擴大紀念週報告〉，《僑胞的動向與路向》，頁 37。

⁴⁰ 鄭彥棻，〈如火如荼的僑胞反共抗俄運動——40 年 8 月 13 日在中央改造委員會紀念週報告〉，《僑胞的動向與路向》，頁 47。

⁴¹ 馮成榮，《鄭彥棻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82 年），頁 127-129。

⁴² 鄭彥棻，〈當前僑務〉，頁 20。轉引自馮成榮，《鄭彥棻傳》，頁 128。

⁴³ 鄭彥棻，〈三項僑務工作的檢討——國民黨中央總理紀念週報告〉。

華僑團體，已達一百多個，人數將近 4 萬人，學者廖英鳴亦認為：「在僑務方面，當時因大陸淪陷，一切都得從頭做起，重新建立華僑與祖國的關係，加強聯繫，使海外和國內團結一條心，到了今天海外華僑回國參加國慶大典者，多達 3 萬 5 千人，心向祖國。此項成就，彥師之功，不可沒也。」⁴⁴而藉由每年僑團回國慶祝十月慶典的儀式，一方面形塑了海外華僑與新「祖國」四海歸心的趨向，從而穩固臺灣在華人世界中中國正統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激勵了國內的民心士氣。

其次，在僑生回國升學方面，「無僑教即無僑務」，是鄭氏民國 41 年接掌僑委會委員長時提出「僑務問題的新認識」中之僑務工作重心。⁴⁵他認為華僑社會正在劇變，原來的領導人物已日漸老大，如何培養繼起的一代，爭取青年對祖國的向心，是海外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⁴⁶但陳誠亦不諱言，在面對東南亞新興狹隘民族主義者時，爭取海外僑教自由是談不到的，「高談闊論均屬無裨時艱。」⁴⁷在國內僅能做一些策助僑教的工作，諸如一、供應海外僑校教科書；二、鼓勵僑生及僑教人員返國受教，提高師資水準；三、輔導僑生回國升學擴大保送及招考分發學校範圍。而對僑教寄最大希望的還是在回國升學的僑生身上，希望他們學成返回僑居地時，能把祖國的文化種子也帶回去，從而輾轉播種。⁴⁸

鄭彥棻對年青學子教育的重視，源起於民國 27 年 7 月，國民黨決議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號召全國優秀青年，在一同組織和訓練之下，加入抗戰建國大業。青年團在武漢籌備之始，鄭氏即奉命參加籌備工作，奉派為幹事之一，之後長時期參與團務工作，對青年團的運作有深

⁴⁴ 陳伯中編，《鄭彥棻八十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1 年），頁 136。

⁴⁵ 鄭彥棻，《僑務問題的新認識》，頁 74。

⁴⁶ 鄭彥棻，〈「乃役於僑」十二年〉，《往事憶述》，頁 129。

⁴⁷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 384。

⁴⁸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 384-385。

刻的感想。⁴⁹因此，在主持黨務改造時，即提出「海外黨部改造工作之重點，在新生力量之培養」⁵⁰，要吸收新黨員和培養青年幹部。而在僑教工作上，也就是要培育華僑青年。而這其中，鄭氏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輔導僑生回國升學，尤其是就讀大專院校，不但可以增進華僑青年對祖國文化的認識，而且可以培養華僑社會的領導人才。⁵¹

但僑生回國升學牽涉層面甚廣，推行起來困難重重，首先，所需經費甚多，是當時財政經年赤字的政府所無法負擔的；另一方面，它牽涉大專院校入學生名額問題，當時教育資源有限，國內學生入學競爭已很劇烈，並沒有餘額來增收僑生。適值 42 年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到東南亞和臺灣訪問，他在東海大學發表演說時，認為華人在東南亞的經濟力量很大，該地區的前途將繫於萬千華僑青年身上，如任令其回大陸接受共產邪說，將來對東南亞遺害甚大，乃建議臺灣應大量招收東南亞僑生，施以反共教育，而美國願意撥款支持此項教育計劃。次年（43 年）成立「中美華僑教育委員會」，制定教育援助方案之基本原則，並於同年下半年開始撥款，總計自 43 年至 52 年，美國政府撥贈臺灣僑生教育經費約 3 億 1 千多萬臺幣及美金 100 多萬元，是為美援僑生款。⁵²在美援的挹助下，僑生回國升學工作得以順利開展，僑生回國人數從民國 39 年的 60 人，迅速增加至民國 47 年的 6,794 人，增幅達百倍以上，而累積人數達 23,569 人。⁵³而該項政策持續至今，已培育了十餘萬名海外華僑青年。而

⁴⁹ 鄭彥棻，「四十三自述」，頁 8-12。

⁵⁰ 〈中國國民黨海外黨務實施綱要——40 年 4 月 18 日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117 次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彙編（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9 年），頁 225。

⁵¹ 鄭彥棻，〈「乃役於僑」十二年〉，《往事憶述》，頁 130。

⁵²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中美合作經援發展概況》（臺北：教育資料館，1957 年），頁 52-53。

⁵³ 夏誠華，《民國以來的僑務與僑教研究（1911-2004）》（新竹：玄奘大學海外華人研究中心，民國 94 年），頁 295。

教育為百年大計，這批僑生返回僑居地後，因與中國大陸沒有淵源，臺灣反而真的成為他們的新「祖國」，而這個「祖國」意識，全然是臺灣僑務（僑教）政策所形塑而成的。如從這一角度觀之，僑生政策雖側重於國內僑教，但實有發酵於海外的功能。

最後，對於輔導華僑經濟方面，則與前二項工作性質截然不同。第一項僑團回國觀光，雖可促進觀光事業，如鄭氏在民國 46 年檢討僑務問題時，即強調該年十月回國的二千名僑胞，他們帶來活動攝影機 14 部、照相機 400 架以上，在臺沖洗照片超過 2 萬幀，郵局代寄書刊 2 千多公斤，⁵⁴不僅促進國內的觀光業，還可以將臺灣介紹給當地朋友或外國友人。但對政府而言，對回國觀光僑團的送往迎來，財政負擔亦是不輕。第二項僑生回國升學，更是長期投資而無法預期其回饋效應。而僑資回國投資問題，它涉及龐大的資金流向，若施行得當，則對雙方而言是雙贏的局面。若以民國 45 年 10 月底召開的「華僑經濟檢討會議」中，陳誠副總統在閉幕典禮所歸納的此次會議的四項重要任務：

- 一是如何加強對俄帝共匪經濟作戰，亦即如何抵抗俄帝共匪對各國的經濟侵略。
- 二是如何加強我政府與各國的經濟關係，並在這個基礎上，使各地僑胞的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
- 三是如何輔導改進僑胞的經濟事業，使當地政府能與僑胞互助合作，以減少僑胞經濟困難，促進僑胞經濟的發展。
- 四是如何使國內經濟建設與僑資運用，更能密切配合。⁵⁵

則可知華僑回國投資實具有多重作用。首先，爭取華僑回國投資，其最

⁵⁴ 鄭彥棻，「三項僑務工作的檢討——國民黨中央總理紀念週報告」。

⁵⁵ 華僑經濟檢討會議秘書處，〈副總統訓詞——十月三十日華僑經濟檢討會議閉幕典禮對全體出席人員致詞〉，《華僑經濟檢討會議實錄》（臺北：華僑經濟檢討會議秘書處，民國 46 年），無頁碼。

重要的價值仍在於政治上的與匪鬥爭，蔣中正總統在該次會議開幕致詞通篇講稿，幾乎皆圍繞在此一主題上。⁵⁶第二及第三點皆涉及僑胞經濟事業與當地經濟間的互動發展，這部分政府其實是鞭長莫及，愛莫能助的。而第四點國內經濟建設與僑資運用的配合，則是該次會議的主要重點。蓋自有僑務政策以來，爭取僑資回國投資即是歷來政府的僑務施政重點，政府遷臺後，僑資對國家經濟、政府財政益形重要。民國 40 年政府播遷之初，國家建設、國防戰備可謂百廢待舉，政府需要籌措大量的資金，而當時朝野普遍認為資金的來源主要來自四方面：政府財政稅收、美援、民間儲蓄及華僑資本。但政府財政及民間儲蓄皆十分貧乏，民國 41 年 4 月行政院長陳誠在接見華僑團體時，即坦承民國 39 年政府財政赤字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懇勉華僑為復國盡最大努力，其指望的便是華僑資本的挹助。⁵⁷次月（民國 41 年 5 月），陳誠即邀約全國工商界鉅子多人，商討關於港澳僑胞工廠遷臺及來臺投資辦法，輿論亦以社論〈爭取海外僑胞的經濟力量〉呼應之。⁵⁸不僅僅如此，當時民間輿論，在論及任何建設的資金籌措時，目光亦集中於華僑資本，如臺灣省工會於民國 41 年 12 月 20 日常務理監事所通過的決議：「請政府切實實現獎勵組織公司、工廠的具體措施，以便誘導游資於生產事業並吸取華僑投資案」⁵⁹，其他諸如地方自治、公營事業如電廠等、電影工業、觀光事業等等，在報章雜誌都不時出現希望引導華僑回國投資的呼籲。由此可知，爭取華僑回國投資是當時朝野所迫切期待的。

此外，引起有關方面高度重視的華僑資本，亦有其外在的客觀因素

⁵⁶ 華僑經濟檢討會議秘書處，〈總統訓詞——十月二十八日對華僑經濟檢討會議全體出席人員致詞〉，《華僑經濟檢討會議實錄》，無頁碼。

⁵⁷ 〈陳院長接見華僑團 闡述臺灣進步情形，列舉三年來各項進步事實 勉華僑為復國盡最大努力〉，《聯合報》，1952 年 04 月 02 日，01 版。

⁵⁸ 社論，〈爭取海外僑胞的經濟力量〉，《聯合報》，1952 年 05 月 10 日，01 版。

⁵⁹ 〈為疏導游資及吸取僑匯 切實獎勵組織公司工廠，省工業會將向當局提出建議案〉，《聯合報》，1951 年 12 月 21 日，06 版。

。民國 40 年代，華僑人數最多的東南亞地區，新興國族國家正掀起如上述之種種排華運動，迫使當地華僑資本大量流向香港。民國 45 年 10 月，鄭氏在華僑經濟檢討會議專題報告「當前僑務與僑民經濟之輔導」時，即指出，「據香港年鑑估計，去年（民國 43 年）一年由東南亞流入香港僑資在 2 億 5 千萬元以上」，⁶⁰而經濟部長江杓更明確指出 43、44 兩年間東南亞各地僑資，流往香港的總數達 8 億餘港元。⁶¹如此龐大的資本，自然吸引兩岸三地政府的注意，在大陸方面，乃設有「華僑回國投資輔導委員會」，積極爭取滯港資金回流，但許多華僑因為害怕資金被沒收而仍觀望中。⁶²故海外華僑資金回那「國」投資，仍在看兩岸給予的條件那一方較優惠。

在此內外情勢驅使下，從民國 41 年開始，臺灣開始出現了鼓勵華僑回國投資的法令政策。最早是民國 41 年 9、10 月先後頒布了〈鼓勵華僑及旅港澳人士來臺舉辦生產事業辦法〉及〈自備外匯輸入物資來臺舉辦生產事業辦法〉，同年 10 月底，全球僑務會議所通過的「當前僑務綱領」第 4 項明確而清楚的要求，「僑胞回國興辦生產事業，對物資輸入、資金週轉、盈餘結匯、動力供應、技術輔導等，均予以協助與便利。」次年（42 年）11 月國民黨七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加強海外工作方案」，即回應僑胞的要求，「鼓勵僑資回國興辦生產事業，簡化其手續，對所需土地、房屋、動力、原料、資金等盡量予以便利，並將若干確有盈利之公營事業出售僑胞經營，以資倡導。」⁶³故 43 年 9 月，行政院依據

⁶⁰ 鄭彥棻，〈當前僑務與僑民經濟之輔導——僑務委員長鄭彥棻出席華僑經濟檢討會議講詞〉，《華僑經濟檢討會議實錄》，頁 30-31。

⁶¹ 華僑經濟檢討會議秘書處，〈國內經濟建設與華僑投資——經濟部部長江杓出席華僑經濟檢討會議講詞〉，《華僑經濟檢討會議實錄》，頁 41。

⁶² 華僑回國投資輔導委員會調查小組，〈關於解放後華僑回國投資情況調查總結〉，內部文件，1954 年 4 月 22 日，頁 1-2。

⁶³ 「加強海外工作方案（報告第一號）——民國 42 年 11 月 14 日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第三次全體會議（民國 41 年 11 月 2 日-14 日）重要決議案

該年 7 月公布的〈外國人投資條例〉，並參酌前二項〈辦法〉，於 9 月 1 日公布新的〈華僑回國投資辦法〉，並在同年 10 月將〈華僑回國投資條例草案〉送立法院審議。⁶⁴44 年 11 月立法院通過〈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及若干相關配套法規，其中最重要當屬〈獎勵投資條例〉。⁶⁵這兩個條例給予華僑在資金的輸入、稅捐減免及工業用地的取得等方面相當的優惠措施，形成僑資企業與本地企業相對的不公平狀態。⁶⁶而這種情勢正如蔣中正在「華僑經濟檢討會議」所說的：「今後政府固望繼續獲得僑胞經濟上的支持，而政府亦必在經濟和物資等方面，給予各地華僑以迫切而必需的扶持。只要於僑胞有益之事，即使對政府增加若干負擔，亦在所不惜」。⁶⁷而以上種種辦法、綱領、方案及條例等，皆顯示了該時期的輔導華僑經濟，已全然傾向於國內的內政事務了。

從民國 46 年鄭氏僑務工作的三個重點——僑團回國觀光、僑生回國升學及華僑回國投資，可以看出臺灣時期的僑務工作，已有明顯朝國內內政事務傾斜的趨勢，亦即由僑務外交轉向了僑務內政，這可能與我國國際外交空間的退縮有正相關性。雖然這種僑務內政，當時的臺灣當局認為是偉大的成就，但它的種種措施也同時產生許多排擠和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引起社會上強烈的質疑聲浪。⁶⁸民國 46 年，鄭氏檢討這三項

），《中國國民黨七至九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上）》，頁 67。

⁶⁴ 許馨燕，《華僑及外國人在臺投資之檢討（1952-1989）》（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民國 93 年），頁 10-11。

⁶⁵ 許馨燕，《華僑及外國人在臺投資之檢討（1952-1989）》，頁 12、14。

⁶⁶ 許馨燕，《華僑及外國人在臺投資之檢討（1952-1989）》，頁 14、31。

⁶⁷ 蔣中正，〈今日華僑自處和報國要道（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廿八日對華僑經濟檢討會議訓詞）〉，載僑務委員會編，《蔣總統對海外僑胞的指示》（臺北：僑務委員會，民國 56 年），頁 32-33。

⁶⁸ 鼓勵華僑回國投資政策雖然有其正面成效，但亦有其頗受非議之處。前後三個有關華僑投資的法令中，最具爭議性的規定在投資種類中的「自備外匯輸入物資」或〈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第三條第二款所規定「由國外輸入國內所需之機器或其他物資」中的「其他物資」。這個規定原意是為了讓華僑輸入資金的價值得到保障，因為當時政府

工作重點時，也指出例如僑團藉由回國進行走私活動、僑生的佔名額問題及僑資企業倒賣等等弊端。但在反共復國的大政方針下，這些問題被包容下來，誠如鄭氏在結論中所說：「我們執行既定的政策，是要克服困難，解決問題中求進步，絕不能以有問題便懷疑政策的正確性。」⁶⁹

肆、結論

民國 38 年中華民國遷臺後，所有建國事業必須重頭做起，包括僑務工作。但重新來過的立基點卻截然不同，必須有新的想法與做法。就僑務工作而言，在新人新政的鄭彥棻主政時代，他以新的論述，強調國民革命（尤其是孫中山）與兩者（臺灣和華僑）之間的關係，成功的將原先毫無關係的海外僑胞與臺灣連結起來，藉由華僑回國慶祝光輝十月，形塑海外華僑對新「祖國」四海歸心的民意趨向，從而穩固了臺灣在華人世界中中國正統的地位。藉由僑生回國接受反共教育，培養了「新」一代華僑，這批留臺僑生在學畢返回僑居地後，其認同的祖國是政治上的祖國，而非其原鄉的祖國。而鼓勵華僑回國投資，更以優沃的經濟利益，吸引僑資生根臺灣。民國 40 年代初期種種的僑務措施，使臺灣時期的僑務工作開展出生機盎然的新頁，除了穩定了中華民國在海外僑社的地位外，這種種內向性的措施，使臺灣島內出現了一批原與它們毫無淵源的「華僑」的成分，而這成分也加重了它「中國」的色彩。

但這種架構（華僑——國民革命——臺灣）可說是全然的政治性連結，亦有其結構的脆弱性。亦即當這共同記憶不再是一方追求的目標

外匯極度缺乏，政府以強硬手段控制官方匯率（多元匯率），因而產生黑市匯率與官方匯率往往有相當大的差距，華僑若依政府匯率輸入資金將出現立即貶值大半的情況。故相關單位提出讓有意來臺投資的華僑以實物申請進口，在臺出售後做為投資資本的辦法。但在執行時馬上出現假借華僑投資名義而行倒賣的所謂「特殊進口商」的現象，引起社會上很大的爭議。

⁶⁹ 鄭彥棻，「三項僑務工作的檢討——國民黨中央總理紀念週報告」。

時，這種虛擬的連結即非常容易解構。其次，由於兩岸形勢太過懸殊，使臺灣國際空間受到強大的壓迫感，而這種壓迫感迫使臺灣太需要海外僑胞支持，無論是外交上的正統性彰顯或是內政上經濟力的挹注，這種渴望使得政府當局必須付出非常多國內的資源，來供養這種支持，而這種扭曲的雙邊關係卻成為島內軍民與海外僑胞間的隱患，具體而言，長久以往，華僑被供養成了「特權」的形象，而當前述的連結瓦解時，這種關係會顯得更為突兀，而終歸趨於顛覆。鄭氏身處時代轉換之機，他曾成功的銜接、置換大陸時期到臺灣時期僑務工作的命題論述，但缺乏先天母體（Matrix）的滋養，後天形塑的代價是昂貴而辛苦的。

徵引文獻

（一）檔案

〈中國國民黨海外黨務實施綱要——40 年 4 月 18 日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117 次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彙編（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9 年（2000）10 月，頁 225-227。

「加強海外工作方案（報告第一號）——民國 42 年 11 月 14 日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全議通過」，〈第三次全體全議（民國 41 年〔1952〕11 月 2 日-14 日）重要決議案〉，《中國國民黨七至九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 83 年（1994）6 月，頁 49-50。

鄭彥棻，「僑務興革計劃及當前僑務改善要點與辦理情形」，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檔號：306,HW782.886 8458（5），no. 306，手稿本，民國 41 年（1952）10 月。

鄭彥棻，「當前的僑務綱領及推進的基本原則」，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檔號：316,HW782.886 8458（5），no. 316，手稿本，民國 43 年（1954）。

鄭彥棻，「四十一年度的僑務」，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檔號：311,HW782.886 8458（5），no. 311，打字本，民國 46 年（1957），頁 2。

鄭彥棻，「三項僑務工作的檢討」，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檔號：329,HW782.886 8458（5），no. 329，手稿本，民國 46 年（1957）。

鄭彥棻，「僑務工作的回顧與展望——僑務委員會成立四十年紀念」，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檔號：1187,HW782.886 8458（5），no. 1187，手稿本，民國 70 年（1981）4 月 10 日。

(二) 近人編輯、論著

-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臺北：國史館，民國 86 年（1997）。
- 林金枝，《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概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 年。
- 彥棻文教基金會編，《鄭彥棻先生紀念集》，臺北：編者刊，民國 80 年（1991）。
- 夏誠華，《民國以來的僑務與僑教研究（1911-2004）》，新竹：玄奘大學海外華人研究中心，民國 94 年（2005）。
-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中美合作經援發展概況》，臺北：教育資料館，1957 年。
- 許馨燕，《華僑及外國人在臺投資之檢討（1952-1989）》，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民國 93 年（2004）。
- 陳伯中編，《鄭彥棻八十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1 年（1982）。
- 馮成榮，《鄭彥棻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82 年（1993）。
- 華僑經濟檢討會議秘書處，《華僑經濟檢討會議實錄》，臺北：華僑經濟檢討會議秘書處，民國 46 年（1957）。
- 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僑務發展歷程——攜手走過的歲月》，臺北：僑務委員會華僑通訊社，民國 79 年（1990）。
- 鄭彥棻，《僑胞的動向與路向》，臺北：海外出版社，民國 41 年（1952）。
- 鄭彥棻，《僑務問題的新認識》，臺北：海外出版社，民國 42 年（1953）。
- 鄭彥棻，「四十三自述」，臺北：司法官訓練所，民國 56 年（1967），打字本。
- 鄭彥棻，〈「乃役於僑」十二年〉，《往事憶述》，臺北：傳記文學出

版社，民國 67 年（1978），再版，頁 115-134。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臺北：國史館，民國 94 年（2005）。

蘇錫文編，《鄭彥棻先生年譜初稿》，臺北：傳紀文學出版社，民國 80 年（1991）。

（三）其他

〈昨天雙十節，本京僑胞冷靜渡過〉，《中原報》（曼谷），民國 38 年（1949）10 月 11 日，5 版。

〈農工商部右侍郎考察商務大臣楊奏考察南洋華僑商業情形〉摺，《東方日報》號 5 期 5（光緒 34 年〔1908〕5 月 25 日），商務，頁 28-29。

〈陳院長接見華僑團 闡述臺灣進步情形，列舉三年來各項進步事實勉華僑為復國盡最大努力〉，《聯合報》，1952 年 04 月 02 日，01 版。

〈為疏導游資及吸取僑匯 切實獎勵組織公司工廠，省工業會將向當局提出建議案〉，《聯合報》，1951 年 12 月 21 日，06 版。

社論，〈爭取海外僑胞的經濟力量〉，《聯合報》，1952 年 05 月 10 日，01 版。

華僑回國投資輔導委員會調查小組，〈關於解放後華僑回國投資情況調查總結〉，內部文件，1954 年 4 月 22 日，頁 1-9。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三十一期